

陈寅恪先生与中国新史学

我一共讲十讲，以陈寅恪先生之学开头，第一讲讲陈寅恪先生与新史学，第二讲讲陈先生治史方法。我是陈先生的学生，从 1944 到 1946 年跟陈先生学习了两年，读了他教的四门课，当时我志不在作历史研究，离开学校就丢掉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怪事，我改而学历史，复习从前陈先生教我的历史。

我两年从陈先生学来的，一辈子受用无穷。刚才郑培凯先生介绍了陈先生的事，他眼睛瞎了，我从陈先生读书的第一年，他的一只左眼瞎了，视网膜剥离，忽然有一天右眼也看不见了，当时在成都一家最好的医院，手术失败了。眼睛没医好，从此成为瞎子。当时我们燕京大学几乎是全校师生在医院守护他，没听过他的课的人，不认识他的人都去他的床前照顾他。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对老师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对陈先生的尊重。所以，陈先生当时很有感慨地说：“想不到，师道尊严还见之于今之教会学校。”到了晚年，他的腿断了。“孙子臆足，世传兵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陈先生兼有这两位古人的遭遇，眼睛瞎了，腿断了，仍写书不断。陈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人，生平读书是背诵如流，传说他可以把十三经大部背下来。他瞎了眼，依然写了一部大书《柳如是别传》，三厚本，是了不起的明清之交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

文化史。还有一部《论再生缘》。写这两部书时，就叫他的助手“你到哪里去翻哪一部书 你到哪里去找哪一个材料……”读给他听 他自己脑子来回思想 就构成文章 然后念出来 旁人记下来。陈先生的学问之大，不是我这个没有学好他的学术的人所能讲述的。我希望诸位能去看一看陈先生的书，也许你们有困难 他是完全用文言文写的 平生不写白话文)但读进去了 你们会有感受。

陈先生之了不起，一是他的学问，一是他坚持“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屈服 他的文章 他绝不准改一个字。中国的知识分子能顶得住压力，提倡“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 几乎只有陈先生一个人 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大家知道梁漱溟先生，是个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但是梁先生被批判了若干次，他和毛泽东对面争论，最后还是做了检讨。而在陈先生身上 面对压力 他绝不屈服 他顶得住。所以，我说当代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只有一个陈先生。

我讲三个部分：

一、陈先生是传统学术之殿军，新史学之开山

这话是套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蔡元培先生曾经讲过“李慈铭是中国旧文学的殿军，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之开山。”我借用这个题目 说陈先生是“传统学术之殿军 新史学之开山”，是两者并在一身的。陈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学问，但他绝不保守，他创造了新史学。传统的学术是所谓四部之学，经史子集，这是以经学统率一切的，其余三种是附带的。苏东坡这个浪漫主义的文人 没有那么多传统观念 他有两句诗：“斗酒纵麒麟廿一史，炉手静对十三经”，还是不离传统思想。麒就是用眼睛去看一看 马马虎虎 不很仔细看。“斗酒纵麒麟廿一史”

的意思是，历史书是一边喝酒一边随便地看一看瞄一瞄就行了。“炉手静对十三经”对经书一定要恭恭敬敬地看。我讲这意思说明从前经学是统治一切的，史学并没有地位，当然，以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史学，独立的文学。但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叫经、史、文不分。从来一些大学问家，很多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大家读《史记》都知道司马迁，司马迁是个很了不起的史学家，同时他又是文学家，《史记》的文字文学性很强用语言表达了人物性格文章写得漂亮极了。后来许多历代的学问家如韩愈、王安石、欧阳修等都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或者还兼经学家。我们经、文、史不分家这个传统，到近代清朝末年以后逐渐消失了。而最后一代保持这个传统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还有陈先生少数几位。但陈先生绝不抱残守阙。陈先生之了不起，除了他坚持中国的传统外还吸收外来思想他一向主张：“一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一面吸收外来的思想”。所以陈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举例指出，道教的吸收佛教、摩尼教，韩愈之吸收新禅宗，使得后来的宋儒能够创成新儒学，他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及学术史上的大事。韩愈是反佛的他主要是反对世俗的佛教因唐朝佛教盛行逃丁避役，国力衰弱，还有武则天的提倡佛教，使社会很混乱。韩愈虽然反对这些，但他恰恰又接受了禅宗的思想，他吸收了“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观念，因而创造了后来宋代理学成为新儒学的条件，这是思想史上的大事。

刚才郑教授介绍陈先生去了很多国家留学，我补充一点吧。他很了不起，他到任何学校都是为着要学某一门学问，他从来不要学位。他为学梵文去读一个学校，得到了学问就走了。为了学另外一门学问，又到另一个学校去，学完又走了，他从来不要学位，这在当时真是很少的。他在外国多年，对外

来的思想、文化、学术非常了解，1949年以后有些人说他是文化遗民不是的。他曾说“我在瑞士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原文的《资本论》。’他曾在德国读书 那时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多不认真读书 只有陈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是‘宁国府的一对石狮子’宁国府最干净的只有一对石狮子 这是《红楼梦》里焦大说的，借用此话意思是他们什么都不管，一天到晚读书。

所谓文化遗民是说他眷恋旧文化 思想很保守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如果是“遗民”就会对前朝有感情 陈先生的祖父是清朝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先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清朝戊戌维新 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 陈宝箴是在湖南做巡抚 实行新政非常有成效之人 后来戊戌失败后 清政府将他撤职查办 甚至有人说是被清政府赐毒药而死的 这并非事实。陈先生之父 陈宝箴之子 陈三立先生 是协助陈宝箴实行新政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虽然他的家世如此，祖父是做清朝大官的 但陈先生对清朝毫无感情。他在教书时 我们的一个同学曾问他：“你对清代政府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们三代 包括我的祖父、父亲和我对清朝政府都没有感情，没有好印象。”

他对国民党也没有一点好印象。有一次，在重庆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请客，征求对国事意见，陈先生写诗：“食蛤哪知天下事 看花愁近最高楼。”他的好朋友吴宓 吴雨僧先生说：“这首诗是讽刺蒋介石的。”他看不起蒋介石 他对“民国”有什么遗民观念呢 他对政治非常厌恶 他去广州时 正是国共打仗 北平围城。1948年蒋介石从南京派飞机去北平接胡适等一批教授去南京 他随机到了上海 接着去了广州岭南大学，最后留在解放后成立的中山大学。虽然台湾和国外想方设法请他去 他不去。有的先生曾经认为陈先生“并不愿意留在广州”后来很后悔留在广州 实际上陈先生哪里

也不愿去，他一生受苦，颠沛流离，年纪大了他想要安静地生活而且广州气候好对他的身体适宜这是人之常情。

他不是什么文化遗民他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讲“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讲他的思想近乎曾国藩与张之洞之间，即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他的思想很多是超前的，不是滞后的。北京三联书店“公共论丛”某期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王焱他说陈先生的思想都是当时外国在思想、文化、学术上最先进的思想，他逐条逐句非常有根据地作详细解说，有兴趣的请去看看。

近年来大家逐渐了解陈先生的书附带介绍一下从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陈先生的文集，基本上都公开发表过了，现在北京三联书店要出《陈寅恪全集》他的女儿在整理除了过去已经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几本论文集外还有许多读书批语、读书笔记正在整理，本预定今年初出版，现在可能来不及。陈先生自己公开说“我不宗马列”。北京要请他去做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不愿去，提出条件：我不宗马列；我不学习政治，我的学生也不学习政治。为什么要这样提就是为了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定于一尊不可能繁荣。陈先生有诗云“大赐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也是这个意思。据说以后还有不用白话文写文章的口头补充。实际上他是不愿去的。尽管说陈先生不宗马列，但现在慢慢发现陈先生史学观点的先进和马列思想有相符合之处，于是有人说“他是吸收了”马列思想的。其实陈先生并不是“吸收了”，他自己的史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史学观点相符合，这是一种暗合，陈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就常用暗合这个词，陈先生早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并非学习马列之后得来。

下面我着重讲三条 讲陈先生思想先进的地方 用以阐述陈先生的史观。

其一 在历史中求史识。这是陈先生治史、研究历史过程中，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观点。即学历史要把历史纳入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的条件，才能理解历史。不能用现在社会现在时代的东西往上贴，即你对当时的历史要研究透彻，才能了解历史，才能得到史识。陈先生常说的“盛衰之感，兴亡之叹”，都是由历史而来。这一条陈先生特别对我们学生谆谆告诫。他自己写的文章，无一不是对当时的历史研究透彻所得。这一条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史学观相近似的，特别是恩格斯一再讲过研究历史要一切纳入当时之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离开这个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就没有历史的真实，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因此有人说，陈先生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他是吸收了马列。其实陈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做历史研究 从来如此。

其二 陈先生非常注意研究经济 尤其制度。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研究当时制度的名著。陈先生在王国维先生挽词的序言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陈先生很注意研究制度，尤其强调研究经济制度。所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特别有一章讲制度，讲经济制度，讲唐代各少数民族边患与经济的关系，陈先生非常注意这点，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常强调的，这是什么道理？中国有一句古话“英雄所见略同”学术相通 如此而已。

其三，陈先生研究历史事物，总是研究彼此之间的联系，绝不孤立地只见一个事物，如研究杯子，绝不只见杯子，而看见与杯子有关的，例如倒进了水，是热水还是冷水。他不会单

就形式来看，这就是我们喜欢讲的辩证法，即彼此之间的联系 相互关系 主次矛盾 矛盾之间的联系 恰恰陈先生也强调这些。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唐代和外族盛衰的关系，陈先生讲到外族彼此的关系，他不只研究唐朝政府和这一个具体外族的关系，也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连锁关系，这一段时期，这个民族衰弱了，唐朝把他打败了，但原因并不由于唐武力之盛，而在于有另一个外族更强大起来了，唐朝才能把他打败，陈先生把它称作外族盛衰之连环性。

我介绍了陈先生的一些学术思想，绝不止于此。他的学术包容文史哲各方面。从前他在大学教书，往往不只是一个系的教授 在燕京他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唐史”、“魏晋南北朝史”是历史系开的课，“元白诗”、“元白刘诗”是历史系和中文系合开的课。早年在清华开课，往往是历史系、中文系合请的教授。陈先生各方面都通，他的诗文很好，他的诗，不只功底深厚，微言大义，实在是无人可及。他反对用白话文，只用文言写文章。胡适之先生佩服陈先生，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陈寅恪的文章写得最坏。”胡适之先生不了解 陈先生的文章是“朴实无华 绚烂归于平淡”这是汪荣祖讲的，讲得很对 陈先生作文章不雕琢，“绚烂归于平淡”。我觉得余英时先生对陈先生的诗解释得好，比旁人高明。

有一个小故事，1932年清华大学招收新生考试，他出了一个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他解释说：“去过的可写 未去过可“梦游”，也可以写。最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陈先生出的另一考题对对子 他出的对子是“孙行者（孙悟空）陈先生想像最理想的对子是“胡适之”为什么 先生说“孙、胡都是猴子 行者正在走路 适之走到哪里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大家反对 说“现在提倡新文学 清华大学考对对子 是开倒车”。陈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长文章，即《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

书》（刘叔雅是清华大学国文系系主任，是刘请陈先生出题目的）文章写得好极了，指出了文学研究的通则。他回答了“出对子”的道理。对子要对得好，要有很好的学问，要学会很多东西，文字学、音韵学等等。“读书自识字始”陈先生常讲这句话：你认识一个字，并不只是会读，还要懂得这字的构造，它究竟是象形，还是形声，还是假借，才能应用自如。他举了一例：“前身本是卢行者，后人过呼韩退之。”这本是苏东坡诗中一对。陈先生认为是千古绝对。前身对后人，本是对过呼，卢行者对韩退之，韩卢是犬名，又可对胡、獠、孙。对对子是学习中国文字的基本训练。

再说一说陈先生的文体。陈先生写历史的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中国传统的史学的写法是纪传体、记事本末体、编年体种种写法，直到近代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写史的方法叫章节体。陈先生写文章既不是章节体，又不是旧的传统体裁，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新体裁。他感觉到，如果完全照传统体裁写东西，有许多不足，完全按西方章节体来写，也有缺点，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愈来愈感觉到的），你要忙于交代，有许多需要展开的专门谈的问题谈不透。陈先生写史之体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体的写法，又吸收了外国章节体的写法。他的文章是，一个大题目之下，不分为篇、章、节、目，他有一大题目，往底下一以贯之，贯穿到底，陈陈相因，没有许多小的具体的篇章节目，你看起来却是相联的，这就是陈先生写史的方法，是“治史而通”的一种表现。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那么高的成就。

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认为大陆迄今为止的学人中几乎只有陈先生做到了。“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这话出自陈先生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两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 1925 年创立。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先生的事是没有的，是吴宓先生一手推荐的）。陈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王国维先生非常要好，王国维先生 1927 年在北京颐和园跳河自杀，陈先生悲痛极了。王国维的遗嘱 请陈先生代办后事 所有的书都交给陈先生与吴宓先生两位处理。陈先生写的王国维先生的碑铭上有几句话成为千古名言 他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提出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可贵 而陈先生一生是按照这种精神去做的 在任何压力下 他都保持‘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他说：“我写文章 违反我的本意的我绝不写”，一生未尝侮食自矜 绝不曲学阿世。这实在非常难 因为在思想统制之下 很难说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特别是与众不同的见解。

三、家学渊源

他的祖父是陈宝箴先生 父亲是陈三立先生 可谓家学渊源。中国传统做学问讲究师承 讲究家法。胡适之先生最反对家法 说“我们只承认做学问有方法 不承认有家法”。其实这话说得绝对化了一点 家法也是一种方法 而且是重要的师承方法。陈先生的家学渊源 他讲的不多 大家可以看他的一篇文章叫《读吴其昌撰 梁启超传 书后》 其中有一段陈先生指出戊戌变法有二源，这点极重要。这一段话如下：

“咸丰之世 先祖亦应进士举 居京师 亲见圆明园干霄之

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群欲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先生的意思是 戊戌变法时 康有为他们搞的那一套与他的祖父陈宝箴先生湖南施行新政是戊戌变法的二源、两个不同的源流。康有为是以今文公羊之学来附会孔子改制，而他的祖父之变法与康有为不同，康之以今文附会孔子改制很多人不赞成，陈宝箴先生不赞成，当时有名的郭嵩焘也批评康有为。陈先生说，他的这种戊戌变法和自家的实践，根据做湖南巡抚体验到保持中国的那一套不行，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也就是陈三立先生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所说“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 非扫敝政 兴起人材 与天下更始 无以图存。”因此讲陈先生的家学渊源，最要看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不同的。康有为的变法并非从实践而来 打了一个“孔子改制”的招牌 不免于不切合实际。而陈先生的祖父包括他的父亲的变法，是因在实际工作中感到中国不学西方不行。因此陈先生的家学，三代的学问恐怕要从上述一段话去理解。但很可惜，陈先生晚年有一些回忆文章 写他的家世、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家与中医的关系等，几篇文章残缺了，现在保存的只有两三篇。

中国做学问讲究义理、词章、考据 假定讲 清朝乾嘉学派，考据很好，义理词章不行。陈先生这样的人做学问是义理、考据、词章兼顾。他的许多文章是非常细的考据，陈先生

通各国文字，因此他所看见的材料原始文献比所有的人要多，但他并不以此炫耀他的学问，他经常用的还是普通常见的资料。他的考据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是由考据的结果能够看出一个原则上的大问题。还有一位陈援庵——陈垣先生 陈寅恪先生生前也很佩服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的很多文章是陈先生写的序。但请允许我这样说，不是对前辈不敬，陈寅恪先生高明于陈垣先生的，即他不为考据而考据，他的考据很细致，由小见大，解决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陈垣先生的许多书，非常细致，非常详细，非常深刻，但停留在考据上。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宋朝的大学者朱熹，他说“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我想一代学者陈寅恪先生也同样是“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陈先生的不同处在于他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陈先生了不起的地方。

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我讲两个问题：一是讲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二是讲陈先生的著作中，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史学界继续研究。当然陈先生的学问，论述的广度和深度绝非这两个问题范围所能包括，但我认为研究这两大问题比较有很重大的意义。

一、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法

上次讲座我提到一句“中国传统做学问叫做‘义理、考据、词章’”，义理是原则，考据是为了说明一个原则。然后是词章，用以表达义理。写一本书，一篇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叫义理。义理有了之后，方法非常重要，方法有各种，甚至一个专家有他自己家传之法。陈先生治史方法可以归纳为两条。

第一 以诗证史 从史论诗。

陈先生给中文系、历史系开课，他上课讲诗，用唐代诗人做的诗来证明当时之历史，叫以诗证史，反过来他讲历史时往往从史论诗，以历史依据来论述诗，从唐代之诗论证唐朝的历史，这是陈先生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方法。我不多举例，凡是读过陈先生书的人都能充分理解陈先生的这种独特方法。我推荐大家读他的一本有名的书《元白诗笺证稿》。元、白是中

唐时期的两位诗人，一位元微之即元稹，一位白居易即白乐天，两位一唱一和的“元和体”影响很大。两位写的诗很多涉及中唐时期的历史，如果你们仔细花力气读《元白诗笺证稿》，从开头到结尾，你们会懂得陈先生的以诗证史的重要。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写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之忠贞爱情（不要以为皇帝是统治者没有什么爱情，只有劳动人民才有爱情），真正的爱情。白居易同情他们从相爱到安禄山造反逃难途中，在马嵬坡唐玄宗不得不赐死她。杨玉环死后，玄宗苦苦思念她，梦中相思，情爱弥笃。乱事平定，唐玄宗梦见她。陈先生讲这首诗不是像上文学课读诗，背诵，逐字逐句讲，他要求你上课前已熟读此诗，在你已经非常理解的基础上听课，他从历史角度讲这首诗写得是否符合唐朝当时情况，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亦补历史之所未详。

记得五十五年前，陈先生给我们开“元白诗”课，开始就讲《长恨歌》，连讲几课，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即杨入宫当妃子是否处女。我们这些年轻人初以为无聊，没意思，有点怪。其实陈先生不是在讲诗，他是在讲历史，在讲唐朝的婚礼制度。原来杨玉环并不是开始就做唐明皇的妃子，之前已是寿王妃，唐玄宗偶然看见她，要她做了自己的妃子。陈先生根据唐朝之婚礼制度问名、纳采、纳吉等等都讲了，来证明杨玉环曾婚于寿王。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学家，他从一两句话一件具体事情出发，让我们学生毫不感枯燥地学习了唐朝的婚姻制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元微之有一句诗“努力庙谟休用兵”，陈先生亦据此证史。唐代中叶延续了几个朝代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叫“牛李党争”，著名的朋党之争。中唐时期有两个有名的宰相，一个叫牛僧孺，一个叫李德裕，两人出身不同，一是进士出身，一是非进士出身，政治主张不同，两人手下各有

一群人 势力很大 左右朝政 结党互相排斥 互相敌对，一直斗争几十年 因此甚至使皇帝感到非常困难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朋党帮派斗争影响了朝政，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影响了社会生活，是很大的事。元微之的诗“努力庙谟休用兵”不主张打仗。因为牛党和李党政治主张很大不同的一个分界限，李党对民族外患内乱主张用兵打仗，是强硬派，牛党主张不打仗，和平解决。元微之这句话主张不打仗。陈先生根据这句诗认为元微之是牛党，当然再根据其他考证也证明元是牛党。我这里就简单地举一本书，一句诗来证明陈先生讲历史从来是“以诗证史 从史论诗”。

第二 由小见大。

作论文 作研究可能有些小题目 有些具体的细节 陈先生的学问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谈的看似小事，但说明论证了一个大问题。上次讲的钱穆先生说的“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这好像是个方法，其实不只是个方法问题。稍加引申说 我们中国人做学问 现在常见不少论文“空对空”专说大话，没有具体的事例能说明所讲的原则。西方的汉学家在方法上很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中不少往往是 detail 很细，细得往往停留在所提的事实上，只能由小见小，看不出大问题大原则。陈先生亦“以大儒而通考据 事固无难”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他能由小见大。现举两例：

a. 宋朝有个赵彦卫 写了本书《云麓漫钞》 原文有一段：“唐之举人 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 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 谓之温卷 如《幽怪录》传奇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 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

这是本很普通的书 许多人看过 但没有人用此材料写文章发挥大作用。我解释一下这段文字的意思：

唐朝举人要考进士，他要先把自己写的东西送给将来对他中式有关的人或名人看，这叫“行卷”。过几天，他再送上去，叫“温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当然是为了使掌握文衡的人，有名的文学家，甚至将来的考官多了解他，他就不断地“行卷”、“温卷”。他所送去的文章，唐代当时叫“传奇”，今天叫小说，不是堂而皇之的议论国家大事的著作，为什么？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举例《幽怪录》说：“这种传奇文章同时具备了几种体裁（散文、诗），可以看出史才（对历史掌握的才能）、诗笔（诗写得怎样）、议论（政治论述），这是段大家可见的普通材料。”

我曾在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陈先生通中外多种文字，包括藏文、满文、梵文、西夏文、英文、法文、德文等。但我所见陈先生写的文章中，除了早年论述佛经之著作，用了外人所不常见之材料，用他精通之梵文写的外，几十年间陈先生写的书、文章都是用的大家所能看见的普通材料，并非什么“壁中书”、“井中藏”。为什么我们看见常见材料，做不出学问，而陈先生却做出了大学问，这就是陈先生作为一个大史学家的高明。

比如刚才讲的赵彦卫《云麓漫钞》中一段，大家都看见，不以为意，无非知道唐朝举人要行卷、温卷，行卷、温卷最重要的作品是传奇。陈先生与众不同，他看了这材料就一连串地考证出大问题。他讲，为什么叫文备众体，为什么可看史才，为什么可看议论。传奇和诗是分开的，并不是同在一篇作品里，比如，有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就有陈鸿写的《长恨歌传》，有元微之写的《莺莺传》，就有李公垂写的《莺莺诗》，诗和传奇是配套的。从《长恨歌》、《莺莺诗》可以见诗笔，指韵文而言。史才从《长恨歌传》、《莺莺传》得见运用历史的才能，议论则从传奇最后的结语可见。陈先生断言：歌与传非如一般诗与序文。

的关系，而实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陈先生接着从这三条考证 作出一系列的展开 层层深入 引入了唐代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的一连串大问题。写传奇的大家从唐朝韩愈开始，韩文公是出名的卫道之人，儒家正统，他带头写传奇《毛颖传》实际他并非写人 而是开玩笑 写一支笔的遭遇 笔如何由狼毛、羊毛脱颖而出，《毛颖传》并非成功之作 但韩愈带头 写传奇之风大盛 传奇成了流行作品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风。唐代人的行卷、温卷用传奇 引发传奇大盛 而古文运动与传奇同时产生，最佳之传奇作者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古文运动的产生 非常重要。因为中唐以前的文学、文字，已经僵死了 形式上成套 文字上无新气象 需要引起一次革命。这个唐代以韩愈为领袖 柳宗元等共同作战 的古文运动 等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唐朝传奇的兴起，古文运动的产生 同时 与当时藩镇跋扈有关。藩镇多半是胡人或胡化了的汉人 古文运动因而以尊王攘夷为中心 而最能坚持尊王攘夷思想的人是韩愈 又是文章大家 所以韩愈成为古文运动当然的领袖。这一连串的事陈先生都把它连起来，即从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写唐代行卷、温卷为什么要用传奇，讲文体之关系、文人之关系、政治之关系、社会之关系 把有关唐代的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 都连串起来而作出了一篇大文章 这就叫治禁理丝 或者说串置散钱 细致周密之极，而又目光巨大深邃。这就是陈寅恪大史学家的学问独到之处。着手在细 只是“文备众体”四个字 着眼则大 所成亦大。

另一方面 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陈先生以为韩愈反对世俗之佛 同时作为一个学问家、思想家 也吸收了佛教禅宗的东西 陈先生认为韩愈看见了儒家的弊病 也学了佛教和尚做学问的功夫，“睹儒家之积弊 效僧侣之先河”以《小戴

记》中《大学》一篇阐明“抽象之心性与具体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合无碍 即尽量谈心说性 兼可济世安民 天竺为体 华夏为用”(陈先生的原话)由于韩愈引新禅宗入儒“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理学新儒学之基础，”这是陈先生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可惜陈先生以后，至今许多人讲新儒学，但是尚没有人接着陈先生的文章作下去，讲宋儒学新理学的承传关系。

b. 唐代宫门北门(玄武门)之重大关键。

陈先生说唐代有许多政治革命 中央政治革命、地方政治革命，在重要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讲安史之乱前地方政治革命都未成功，什么道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什么道理？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陈先生把大问题从小地方讲，最后证明为什么这样。他说成败关键在于宫城之北门(即玄武门)左朱雀右玄武 掌握禁军(御林军 侍卫军)手中。唐代都城建置，宫在城北，北门掌握在禁军手中，故北门(玄武门)最重要。先生说：“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 悉决于玄武门 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 而北军统治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因此陈先生讲了一个看似非常小的考证 他从唐高祖、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时发生的四次政变(政治事变)，四次革命的成败都决定于玄武门之得失以及守卫北门的禁军的向背，因此陈先生详细考证了宫城北门的建制(宫在城北 城在宫南 筹看似很细小之事 但他以历次革命的成败论证宫城北门的重要作用，就非常大了，就其大。详考宫城之门之建置小也，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之，乃得其大。所以我说陈先生的学问是以小见大。这话猛然一听，不可理解，能从很小的考证得出重大的结论，即从前中国人做学问所谓大儒与𧪁钉之区别(𧪁钉意思是考据琐碎的小事弄不出名堂)。当然考据很重要，乾嘉学派在清朝很威风，因史料重要，经过认真考据论证的材料才可信，研究最后得出之学